

民营企业党建与社会责任承担: 共同富裕的一种微观实现机制*

郑文全 袁媛 夏春玉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微观实现机制。理论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整合初次分配与三次分配从而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微观机制。第二,企业党建机制是与企业利益权衡机制、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政府规制机制并存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新机制。第三,企业党建机制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具有经济合理性。第四,我国企业党建机制与英美企业独立董事制度和德国企业联合决策制度都是内外部结合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机制。第五,卡罗尔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本质责任在于企业公平责任与效率责任。实证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促进民营企业承担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强化了党组织嵌入对效率责任和公平责任的促进作用;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强化了党组织嵌入对公平责任的促进作用,但对效率责任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党建研究,提出了共同富裕何以实现的一种微观机制,也揭示了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民营企业 党建 企业社会责任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4)02—0030—21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就是追求“公平”,“富裕”就是追求“效率”。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①。初次分配靠企业,主要根据市场原则分配企业内部的收入;二次分配靠政府,主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宏观机制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三次分配靠社会,主要通过组织和个人的公益捐赠与社会共享行为促进社会公平(厉以宁,2018)^[1]。通常认为,企业层面的制度注重效率,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制度维护公平,但实际上企业层面依然存在着能够协调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重要微观机制,那就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江亚洲和郁

收稿日期:2022-12-31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流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体系构建”(18ZDA058);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中国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辽人社函〔2020〕78号);辽宁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LNYJG2022431)。

作者简介:郑文全,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中国式管理和公司治理,电子邮箱:zhengwenquan@dufe.edu.cn;袁媛,女,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电子邮箱:yxwendy@126.com;夏春玉,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东亚企业管理、流通理论,电子邮箱:xiachunyu@dufe.edu.cn。通讯作者:袁媛。

①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EB/OL].2021-08-07.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eqid=8c0d48480013f20d00000002646f6861。

建兴,2021^[2];李海舰和杜爽,2022^[3];阳镇和陈劲,2022^[4])。本文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整合初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微观机制,不仅体现在通过提高员工福利缩小收入差距,也体现在通过约束其单纯牟利的动机和行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这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调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传统的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企业利益权衡机制(Qian等,2019^[5];O'Sullivan等,2021^[6];Tian等,2023^[7]),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长期收益大于由此导致的短期利益损失,企业可能会承担社会责任;二是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Chen等,2018)^[8],第三方组织呼吁和监督的压力越大,企业越可能承担社会责任;三是政府规制机制(Waagstein,2011^[9];Baudot等,2021^[10]),政府部门通过法律条文、行政规定、各类政策、执法部门自由裁量权等强制力量迫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那么,是否存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制呢?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党建机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机制。2023年7月19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指导,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

基于此,本文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协调公平与效率的一种微观机制;指出企业党建机制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机制;考察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的党建机制具有经济合理性;揭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Carroll,1979^[11];1991^[12])的本质责任是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实证检验民营企业党建对企业承担公平责任与效率责任的影响,以及企业家兼任党委书记、企业家在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调节作用。以上研究为本文提出的“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共同富裕的一种微观实现机制”论断提供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如下:一是从管理学科的微观视角为共同富裕的微观实现机制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尽管现有研究已经从经济学、财政学等宏观视角,探讨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包括社会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等方面,如收入分配制度(刘培林等,2021^[13];孙豪和曹肖焱,2022^[14])、公共服务均等化(李实和杨一心,2022^[15];李实和朱梦冰,2022^[16])、财政结构(吕炜和靳继东,2021^[17];吕炜和靳继东,2022^[18])、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周业安,2003^[19];周业安等,2004^[20];周黎安,2007^[21];魏光兴和陈永恒,2022^[22])以及更为具体的县域间的竞争(张五常,2017^[23];王修华和赵亚雄,2023^[24])等,但鲜有研究从管理学科的微观视角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理解为共同富裕的一种微观实现机制,并从这个新角度揭示共同富裕何以实现。二是对社会责任重新分类并提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机制。在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基础上,认识到其本质责任是企业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并明确其在金字塔模型中的边界。进一步,本研究将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归纳为企业利益权衡机制、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政府规制机制,并提出企业党建机制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外结合新机制,进而把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由三种机制扩展为四种机制。三是系统性探究党建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后果。关于党建方面的研究更多关注党组织嵌入的重要作用(Zhou等,2021^[25];肖红军等,2022^[26]),较少系统探究不同层次的党建构成要素对社会的影响,也没有进一步研究党组织影响社会责任的社会后果。本研究系统性探究不同层次的党建构成要素对社会的影响,并将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理解为共同富裕的一种微观实现机制。

二、文献回顾

1. 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

现有关于共同富裕何以实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两大层面。社会经济政策层面,收入分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财政结构等是影响共同富裕的

关键因素。刘培林等(2021)^[13]认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提高其富裕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孙豪和曹肖焱(2022)^[14]认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李实和杨一心(2022)^[15]、李实和朱梦冰(2022)^[16]分析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吕炜和靳继东(2021)^[17]、吕炜和靳继东(2022)^[18]基于财政学视角,剖析了财政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财政不仅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基础,还关乎共同富裕的内在激励机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县域之间银行业竞争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周业安(2003)^[19]、周业安等(2004)^[20]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战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进取型和保护型策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掠夺型策略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周黎安(2007)^[21]则从地方官员的晋升角度出发,提出中国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模式是中国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此基础上,魏光兴和陈永恒(2022)^[22]进一步运用锦标赛理论,从先天差异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通过构建标准经济学框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解析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演化机理,构建了共同富裕的政策逻辑。张五常(2017)^[23]认为,县域之间的竞争制度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这种制度竞争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关注本地经济的发展,通过吸引投资、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繁荣。王修华和赵亚雄(2023)^[24]进一步指出,县域之间银行业竞争通过促进农户绝对收入增长和缩小农户相对收入差距,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周黎安、周业安和张五常等人虽然都只强调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其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内在地协调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努力推进共同富裕。

上述研究是解释共同富裕何以实现的有益角度。不过,一方面,既有研究多以经济学、财政学为主线,鲜有文献从管理学角度解释。另一方面,过去研究大多从宏观的政府顶层设计层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未涉及微观层面的解释。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党建能够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且,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衔接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微观机制,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福利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也可以通过约束企业单纯追求利润的动机和行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来推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共同富裕的一种微观实现机制。

2. 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研究

如前所述,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促进机制主要有三种,但均存在不足。一是企业利益权衡机制(Qian等,2019^[5];O'Sullivan等,2021^[6];Tian等,2023^[7]),但并非所有企业都会追求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长期利益,可能有一部分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二是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Chen等,2018)^[8],第三方部门主要依靠社会压力,并且强烈依赖志愿行为,但社会压力毕竟有限,而且第三方组织本身也存在志愿失灵以及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三是政府规制机制(Waagstein,2011^[9];Baudot等,2021^[10]),但法律制度和行政规定本身是社会道德的最低标准,其所规定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通常就低不就高,并且法律和行政规定一旦制定后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所要求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往往会因社会的持续发展存在时代滞后效应。因此,传统的机制对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仍然难以保证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需要寻找新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制。

本文认为,微观层面的企业利益权衡机制可以理解为企业内部机制,中观层面的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和宏观层面的政府规制机制可以视为企业外部机制,同时企业层面也存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外部结合机制,英美企业体现为独立董事制度,德国企业体现为联合决策制度,而中国企业体现为党建制度,典型如在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如表1所示。进一步,虽然中国企业党建制

度、英美企业独立董事制度和德国企业联合决策制度均是内外部结合模式,但三者^[27]在制度设计和决策制定方面有较大区别,如表 2 所示。在制度设计方面,英美企业的独立董事制度和德国企业的联合决策制度是强制规定,中国国有企业依法依规设立党组织,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则是自愿设立党组织。在决策制定方面,英美企业独立董事制度、德国企业联合决策制度中要求独立董事、工人代表直接参与企业决策,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和“讨论前置”制度直接参与企业重要决策(柳学信等,2020)^[27],而中国民营企业^[28]和外资企业党组织发挥引导、监督、维权、统战、协调和企业文化建设等重要作用(李少斐,2008)^[28],对企业决策产生间接影响,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党建制度的区别如表 3 所示。

表 1 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

层次	企业内部	企业外部	企业内外部结合
微观	企业利益权衡机制		英美企业独立董事制度 德国企业联合决策制度 中国企业党建机制
中观		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	
宏观		政府规制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2 英美企业独立董事制度、德国企业联合决策制度、中国企业党建制度的比较

比较项目	英美企业独立董事制度	德国企业联合决策制度	中国企业党建制度
空间嵌入	企业内外部结合	企业内外部结合	企业内外部结合
制度设计	强制设立	强制设立	依法依规设立/自愿设立
决策制定	直接参与	直接参与	直接参与/间接参与

注:企业党建制度以党组织嵌入为例

表 3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比较

比较项目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制度设计	依法依规设立	自愿设立	自愿设立
决策制定	直接参与	间接参与	间接参与

注:企业党建制度以党组织嵌入为例

3. 民营企业党建影响社会责任研究

现有关于民营企业党建的研究主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政治关联理论探究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对绿色责任、绿色创新等的影响(Zhou 等,2021^[25];肖红军等,2022^[26])。这些研究深化了对民营企业党建运行机制的理解。但是,既有研究侧重关注党组织嵌入的重要作用,未系统研究不同层次企业党建构成要素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现有关于民营企业党建影响社会责任的研究集中于企业边界内,没有进一步探究民营企业党建影响社会责任的社会效应。本文认识到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共同富裕的一种微观实现机制,这对于理解共同富裕何以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党建机制促进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合理性

由上述可知,民营企业党建机制是与企业利益权衡机制、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以及政府规制机制并行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第四种机制,并能够有效弥补上述三种机制的不足。接下来,本文从民营企业以直接方式、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比较展开分析,探究民营企业党建机制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合理性。

一项社会责任可以由民营企业直接承担,也可以由企业向国家纳税或者向第三方机构捐款等途径来间接承担,到底是直接承担还是间接承担,取决于哪种方式的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更优。

如图1所示,以环境保护为例,由于民营企业直接承担社会责任缺乏规模经济,所以直接方式下,企业的社会成本曲线DS和企业成本曲线DE前期都比间接方式下的社会成本曲线IS和IE要高。但是,由于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在过了A点和B点之后,直接方式的社会成本曲线和企业成本曲线都比间接方式更低。从整体社会效率来看,在A点以后,民营企业就应该采取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但此时直接方式的企业成本仍比间接方式的企业成本高,只有过了B点企业才愿意采取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于是A点和B点之间就会有一个 T_1 到 T_2 的时滞,这就造成了一部分社会福利的损失,也就是图中(F-E)。

如何使民营企业在时点 T_1 处就可以以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进而提升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有四条途径:一是提高民营企业以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如加倍收取环保方面的税费,从而使间接方式的企业成本曲线IE向上移动到 IE' 曲线,并与直接方式的企业成本曲线DE相交于 A' 点。二是降低民营企业以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如减免某些方面的税费,从而使得直接方式的企业成本曲线DE下移至 DE' 曲线,并与间接方式的企业成本曲线IE相交于 A^2 点。三是在民营企业中普遍引入党组织,使得企业即使以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也能够自觉降低社会成本,从而使间接方式的社会成本曲线IS下降至 IS' ,消除时滞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四是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促使企业主动降低其在公司内部以直接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使得直接方式的企业成本曲线DE向 DE' 方向移动。这四种方式均有很强的政策启示意义,尤其是后两种方式彰显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党建机制在提升社会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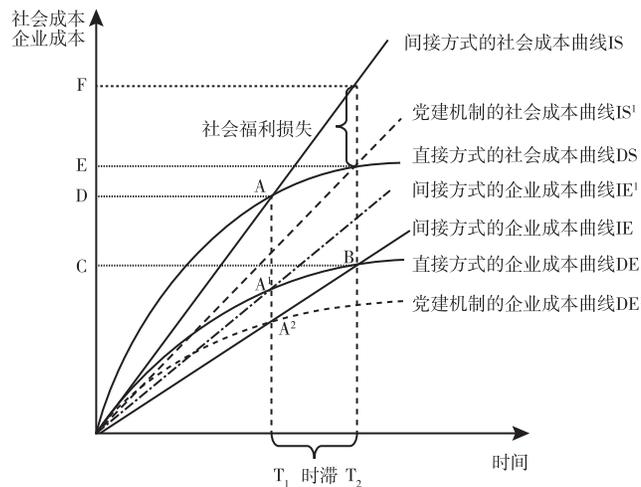


图1 民营企业党建机制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2. 企业社会责任的重新分类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经典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Carroll, 1979^[11]; 1991^[1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从低到高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及慈善责任。经济责任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指企业在法律框架内承担生产性任务以实现经济目标。伦理责任指社会的经济和法律中隐含一定的伦理规范,但公众仍旧期望企业遵循那些尚未成为法律的伦理规范。慈善责任是社会对企业寄予一些没有明确表达的期待,属于一种完全自愿行为。不过,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并未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追求。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的本质在于促进公平的社会责任、提高效率的社会责任。从历史维度看,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起初重视效率,社会责任体现为经济责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责任的外延不断扩展。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重新分类为企业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企业公平责任主要包括企业维护和增进职工权益、环保治污以及社会捐赠等。企业效率责任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

下,企业生产和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本文明确企业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在金字塔模型中的边界,如图 2 所示。在金字塔模型中,经济责任、一部分法律责任是企业效率责任,而一部分法律责任、慈善责任及伦理责任是企业公平责任。在法律责任中,既包含了公平责任,也包括了效率责任。例如,企业遵循《知识产权保护法》《最低工资规定》能够维护社会公平;企业遵守《经济合同法》的规定不仅能够维护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维护社会公平,也能降低交易成本以提高企业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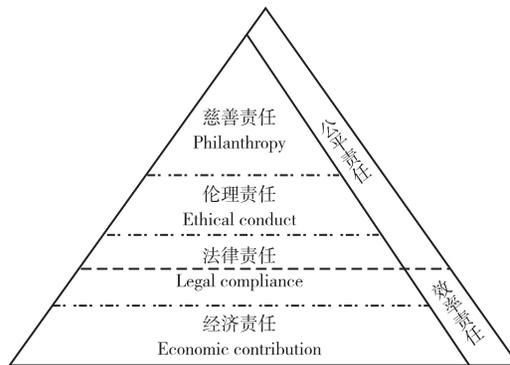


图 2 新的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

3. 党建机制促进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

在明确民营企业党建机制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实现机制并对其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后,需要探究民营企业党建机制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根据民营企业党建方面的研究(Zhou 等, 2021^[25]; 肖红军等, 2022^[26]; 何轩和马骏, 2018^[29]), 民营企业党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民营企业自愿设立党组织; 二是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企业党组织书记; 三是民营企业企业家地方和其他基层党组织任职经验。

制度理论认为, 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决定了企业的治理结构、战略行为等(DiMaggio 和 Powell, 1983^[30]; Scott, 1987^[31])。根据这一理论逻辑, 民营企业党建是政党—国家与民营企业之间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交互式治理机制(何轩和马骏, 2018)^[29], 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民营企业的产权和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企业家手中(陈光金等, 2018)^[32]。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影响企业党组织的建立和运行(郝建等, 2021^[33]; 庄明明等, 2022^[34])。企业家在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经验也会塑造企业家的认知及行为, 进而影响党组织发挥作用。研究表明, 国有单位的工作经验会对个体的观念、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产生持久影响(朱斌等, 2021)^[35]。因此, 本文预期, 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能够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效率责任。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经验进一步影响上述效应。

(1)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公平责任的影响。民营企业党组织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的原因有四点: 第一, 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传承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观的重要载体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通过党建元素的标识性符号、组织生活会等(郑登津等, 2020)^[36], 传承党的政治文化观, 召唤企业成员的政治认同, 促进企业形成党的共享观念(朱斌等, 2021)^[35], 从而为企业家做出承担公平责任的决策奠定认知基础。第二, 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慈善捐赠、公共服务等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方式。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通过与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沟通、与政府主办的公益组织合作(何轩和马骏, 2018^[29]; 黄杰和郑静, 2022^[37])、党支部会议等有助于企业理解公共政策并贯彻执行, 从而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第三, 政府通过民营企业党组织发挥监督作用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王舒扬等, 2019)^[38]。民营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没有监督约束

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过分追逐经济利润而损害公众利益。政府通过引导党建活动,督促企业落实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方针,进而推动企业履行公平责任。第四,民营企业党组织成员的人格化示范作用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重视吸纳企业优秀员工为党员(何轩和马骏,2018)^[29]。党员有贡献社会的认知和行为,对企业家及其他企业成员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使企业家从党员的价值追求、言行举止中理解党的性质、宗旨、初心和使命,进而提高企业承担公平责任的积极性。研究表明,有入党经历的党员 CEO 有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烙印,促进企业增加环境投资(Zhou 等,2021)^[25]、慈善捐赠(连燕玲等,2021)^[39]等。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₁: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能够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

(2)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对企业效率责任的影响。民营企业党组织促进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的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任务的重要渠道促进企业承担效率责任。我国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阶段,不断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仍旧是重要任务。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如同各级党组织贯彻党的经济任务一样,通过任务沟通、信息互动(肖红军等,2022^[26];徐细雄等,2020^[40]),及时、准确地向企业传达党和政府最新经济政策信息,减少党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何轩和马骏,2018)^[29],从而提高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的信心。第二,政府通过民营企业党组织发挥党纪法规约束作用(王舒扬等,2019)^[38],督促企业承担效率责任。民营企业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因而可能增加公关、招待等短期导向活动提高企业绩效(Wang 和 You,2012)^[41]。政府通过实地查看等方式对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检查指导,不仅贯彻党和国家提高经济效率的方针政策,也将党纪规范约束延伸到企业,从而促进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第三,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的背景下,相对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企业保障了企业的合法性(章高荣,2019)^[42],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开发市场和拓宽销售渠道,从而提高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的信心。第四,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有吸纳优秀人力资本的作用。党员普遍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何轩和马骏,2018)^[29],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往往有更高的社会公平性,这有利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吸纳更多的优秀人力资本,进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为企业承担效率责任提供人才保障。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₂: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能够促进企业承担效率责任。

(3)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对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党组织书记是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领头人,企业家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交叉任职模式有利于党组织在企业决策中发挥作用(柳学信等,2020^[27];庄明明等,2022^[34]),使企业决策倾向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从而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首先,企业家是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和最高权力者(陈光金等,2018)^[32],在企业决策中有绝对主导作用。当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党委书记时,企业内部实现领导一体化(柳学信等,2020^[27];王舒扬等,2019^[38]),进而企业家做出符合党组织价值观的行为时更容易被顺从和模仿。因此,与企业家未兼任党委书记的企业相比,在企业家兼任党委书记的企业中,领导一体化使企业党组织成员更能发挥示范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其次,如果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企业党组织不仅直接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和指导(陈东,2015)^[43],也面临更多审查与纪律监督压力和公众的认同压力,这进一步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研究表明,民营企业企业家和党委书记二职合一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王舒扬等,2019)^[38]、提升企业长期雇佣员工的比重(徐细雄等,2021)^[40]。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_{3a}:在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的情况下,企业党组织设立对公平责任的促进作用将被增强。

(4)民营企业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对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

应。民营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增强了党组织设立对公平责任的影响。第一,企业家认知框架的形成可能源于工作经验,经过长期的习惯化和制度化,企业家逐渐形成与工作匹配的认知(斯科特,2021)^[44]。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经过定期的教育与培训通常对党的政治文化观有较高的认同感,进而形成整体利益、以民为本的观念。创办企业后,有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往往会将该认同感和观念移植到企业中,协助企业党组织建立组织文化观,从而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第二,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是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举措。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意味着其具有较强政策领悟能力,从而有助于激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承担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研究表明,相对于不具备体制内经历的民营企业家,具有体制内经历的民营企业家政策领悟能力较强,进而对企业后续经营产生影响(Mccaffrey,2014^[45];戴维奇等,2016^[46])。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₃₀:在民营企业家具有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企业党组织设立对公平责任的促进作用将被增强。

(5)民营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对党组织与效率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民营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的交叉任职模式增强了党组织对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的促进作用。第一,这一职务保障使党组织受到的双重监督压力,增强其底线思维,督促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第二,在党组织书记代表党组织对外交流时,双重身份作为一种背书信号,能够协助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增强市场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的信心。第三,民营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强化企业对外的政治关联(雷海民等,2012)^[47]。该身份作为与党和政府直接沟通的信息和政策渠道,帮助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直接获取必要的资源和市场供求信息(何轩和马骏,2018)^[29],进而提高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的信心。研究表明,企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二职合一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生产和创新等活动投入(何轩和马骏,2018^[29];程博等,2015^[48])。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₄₀:在民营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的情况下,企业党组织设立对效率责任的促进作用将被增强。

(6)民营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对党组织与效率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民营企业家地方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增强了党组织对企业承担效率责任的促进作用。具有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在体制内工作过程中更重视对全局意识、长期思维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培养。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具有国有企业经历意味着有高水平的人际沟通能力、紧密的政策资源以及熟悉规范的治理结构(徐尚昆等,2020)^[49]。不过,具有地方党组织工作经验的企业家由于过去在体制内长期工作,往往缺乏特殊的技术能力。戴维奇等(2016)^[46]认为,体制内单位是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单元,其形成的组织化依赖使得长期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员缺乏技术技能。因此,相对不具备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具有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对具有专门技术门槛的人才青睐有加,并且愿意主动通过党组织吸纳优秀的党员人力资本,进而促进企业承担效率责任。所以,民营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的任职经验增强了企业党组织对效率责任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₄₀:在民营企业家具有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企业党组织设立对效率责任的促进作用将被增强。

四、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在2008

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展开的四次全国民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库。四次调查范围包含了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不同规模、行业的企业。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调查内容虽有变动,但大部分问题及询问方式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便于本文根据研究需要构建一个包含四期的混合截面数据集。混合截面数据分析的一个好处是,增加样本量进而获得更好的估计量和更有效的检验统计量。在稳健性检验中,运用2011—2020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检验。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剔除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和异常值样本,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1%水平Winsorize缩尾处理以克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最终获得共计5766个样本。

2.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1)企业公平责任。本文将企业慈善捐赠投入、治理污染投入、社会保险投入分别除以企业资产规模后加1取自然数对数,三者提取1个主成分因子衡量企业公平责任。2)企业效率责任。本文将企业扩大原有产品生产规模投入、新产品研发投入、销售收入、净利润分别除以企业规模后加1取自然数对数,五者提取1个主成分因子衡量企业效率责任。

(2)解释变量:党组织设立。企业中建立了党组织,编码为1,未设立则为0(Zhou等,2021^[25];何轩和马骏,2018^[29])。

(3)调节变量:1)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企业家担任了企业党委书记编码为1,否则为0(王舒扬等,2019^[38];徐细雄等,2020^[40])。2)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企业家是地方或基层党委委员编码为1,否则为0。

(4)控制变量:借鉴党建和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Zhou等,2021^[25];郑登津等,2020^[36]),本文控制了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和宏观环境层面的变量。企业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家年龄,问卷调查时间减去企业家出生年份,取自然数对数;性别,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教育程度,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分别编码为1、2、3、4、5、6;政治参与,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编码为1,否则为0;体制内工作经历,企业家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经历编码为1,否则为0;政治地位,企业家对自身政治地位评价,从1-10编码;企业家所有者权益占比,企业家个人所有者权益占比;决策管理,1代表企业家做出重大决策,0代表没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问卷调查时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取自然数对数;企业规模,企业雇用人数取自然数对数;所有者权益,企业所有者权益加1取自然数对数。治理结构,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则各为1,否则为0,三者之和除以3。宏观环境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市场化水平,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2022)^[50]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对应的一级指标,各地区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总指数。本文还在模型中控制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和年份效应的影响。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测量和编码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公平责任	<i>CSR_F</i>	企业慈善捐赠、治理污染、社会保险投入的相对值提取1个主成分因子
	企业效率责任	<i>CSR_E</i>	企业扩大原有产品生产规模、新产品研发、销售收入、净利润的相对值提取1个主成分因子
解释变量	党组织设立	<i>Party</i>	1代表设立党组织,0代表未设立党组织
调节变量	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	<i>Role</i>	1代表企业家担任企业党委书记,0代表未担任
	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	<i>Experience_P</i>	1代表企业家是地方或基层党委委员,0代表不是

续表 4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控制变量	企业家年龄	<i>Age</i>	问卷调查时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对数)
	企业家性别	<i>Gender</i>	1代表男性,0代表女性
	教育程度	<i>Education</i>	1、2、3、4、5、6分别代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
	政治参与	<i>Participation</i>	1代表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0代表未担任
	体制内工作经历	<i>Experience</i>	1代表企业家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经历,0代表没有
	政治地位	<i>Satus</i>	企业家对自身政治地位评价,从1-10编码
	治理结构	<i>Structure</i>	具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各为1,除以3
	决策管理	<i>Decision</i>	1代表企业家做出重大决策,0代表没有
	所有者权益	<i>Equity_1</i>	企业所有者权益(加1取对数)
	企业家所有者权益占比	<i>Equity_2</i>	企业家个人所有者权益占比
	企业年龄	<i>Firmage</i>	企业成立年份(对数)
	企业规模	<i>Size</i>	企业雇佣人数(对数)
	市场化水平	<i>Region</i>	市场化总指数(滞后一年)
	年度虚拟变量	<i>Year</i>	1代表是该年度,0代表不是该年度
行业虚拟变量	<i>Industry</i>	1代表制造业企业,0为其他	

五、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5 是变量描述性统计。党组织的均值为 0.392,说明有 39.2% 的企业建立了党组织。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的均值为 0.174,说明有 17.4% 的企业家担任党组织书记。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均值为 0.0409,说明有 4.09% 的企业家具有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企业家性别、政治参与的均值为 0.857、0.481,意味着有 85.7% 的企业家是男性企业家、48.1% 的企业家有政治身份。市场化水平的离散系数为 1.862,说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5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CSR_F</i>	0.132	1.364	-0.563	22.030
<i>CSR_E</i>	0.107	1.525	-1.389	17.020
<i>Party</i>	0.392	0.488	0.000	1.000
<i>Role</i>	0.174	0.379	0.000	1.000
<i>Experience_P</i>	0.0409	0.198	0.000	1.000
<i>Age</i>	3.821	0.189	3.258	4.190
<i>Gender</i>	0.857	0.350	0.000	1.000
<i>Education</i>	3.671	0.783	1.000	5.000
<i>Participation</i>	0.481	0.565	0.000	2.000
<i>Experience</i>	0.619	0.624	0.000	2.079
<i>Satus</i>	5.268	2.130	1.000	10.000
<i>Structure</i>	0.501	0.331	0.000	1.000
<i>Decision</i>	0.414	0.493	0.000	1.000
<i>Equity_1</i>	6.329	1.970	1.386	10.52

续表 5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quity_2</i>	0.714	0.301	0.000	1.000
<i>Firmage</i>	2.068	0.691	0.000	3.219
<i>Size</i>	4.081	1.599	0.000	7.758
<i>Region</i>	7.289	1.862	0.000	11.16

注: N=5766

表 6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企业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效率责任相关系数显著为正 ($p < 0.01$; $p < 0.01$), 这与前文假设 H_1 、假设 H_2 的预测相符。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与公平责任、效率责任显著正相关 ($p < 0.01$; $p < 0.01$), 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经验对公平责任、效率责任显著正相关 ($p < 0.1$; $p < 0.1$), 与假设 H_{3a} 、假设 H_{3b} 、假设 H_{4a} 、假设 H_{4b} 的预测相符。控制变量中, 企业家教育程度、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等与公平责任、效率责任显著正相关。为了进一步验证相关变量的因果关系, 本文将进行回归分析。

表 6 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CSR_F	1.000								
2.CSR_E	0.637***	1.000							
3.Party	0.187***	0.232***	1.000						
4.Role	0.122***	0.120***	0.461***	1.000					
5.Experience_P	0.016*	0.018*	0.074***	0.098***	1.000				
6.Education	0.074***	0.073***	0.158***	0.102***	-0.009	1.000			
7.Equity_2	0.006	-0.008	-0.097***	-0.102***	-0.036***	-0.103***	1.000		
8.Size	0.295***	0.383***	0.493***	0.280***	0.036***	0.191***	-0.126***	1.000	
9.Region	0.016*	0.130***	0.050***	0.010	0.034***	0.009	-0.042***	0.117***	1.000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模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 下同

2.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检验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效率责任之间的关系, 并考察企业家兼任党委书记、企业家地方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本文选择稳健的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调节效应的检验采用交互项的方式进行, 对连续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所有回归方程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7 列示了假设 H_1 、假设 H_2 的回归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3 为包括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 2、模型 4 将企业设立党组织引入基准模型。模型 2 的结果显示, 党组织设立与企业公平责任显著正相关 ($p < 0.1$), 说明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对公平责任起促进作用。模型 4 的结果显示, 党组织与企业效率责任显著正相关 ($p < 0.1$), 说明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能够促进企业承担效率责任。回归结果与假设 H_1 、假设 H_2 的预测相一致。

表 7 党组织设立与企业公平责任、企业效率责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CSR_F</i>	<i>CSR_F</i>	<i>CSR_E</i>	<i>CSR_E</i>
<i>Party</i>		0.0749* (1.6628)		0.0884* (1.7571)
<i>Role</i>	0.1145** (2.2440)	0.0825 (1.4616)	0.0202 (0.3393)	-0.0175 (-0.2705)

续表 7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CSR_F</i>	<i>CSR_F</i>	<i>CSR_E</i>	<i>CSR_E</i>
<i>Experience_P</i>	-0.0044 (-0.0513)	-0.0084 (-0.0987)	-0.0981 (-1.1014)	-0.1029 (-1.1552)
<i>Age</i>	-0.2532** (-2.5535)	-0.2558*** (-2.5833)	-0.3955*** (-4.0234)	-0.3986*** (-4.0604)
<i>Gender</i>	0.0107 (0.2624)	0.0101 (0.2496)	0.0340 (0.7395)	0.0334 (0.7268)
<i>Education</i>	0.0211 (0.8019)	0.0191 (0.7251)	0.0265 (1.0385)	0.0242 (0.9476)
<i>Participation</i>	0.0335 (0.9915)	0.0261 (0.7832)	0.0557 (1.4489)	0.0470 (1.2282)
<i>Experience</i>	0.0257 (0.7955)	0.0240 (0.7420)	0.0012 (0.0359)	-0.0007 (-0.0207)
<i>Satus</i>	0.0163* (1.6764)	0.0161* (1.6582)	0.0268*** (2.7161)	0.0266*** (2.6980)
<i>Structure</i>	0.0960* (1.6948)	0.0899 (1.6069)	0.1613*** (2.6226)	0.1541** (2.5144)
<i>Decision</i>	-0.0139 (-0.4063)	-0.0120 (-0.3502)	-0.0735* (-1.9454)	-0.0713* (-1.8860)
<i>Equity_1</i>	-0.0747*** (-6.3413)	-0.0755*** (-6.3761)	-0.0476*** (-3.2652)	-0.0485*** (-3.3170)
<i>Equity_2</i>	0.0862 (1.6072)	0.0877 (1.6346)	0.1181* (1.8523)	0.1199* (1.8795)
<i>Firmage</i>	0.2320*** (10.2468)	0.2295*** (10.1938)	0.3477*** (13.6526)	0.3447*** (13.5306)
<i>Size</i>	0.2727*** (15.1067)	0.2667*** (14.4215)	0.3201*** (17.6469)	0.3129*** (17.0058)
<i>Region</i>	0.0288*** (3.1239)	0.0294*** (3.1899)	0.0747*** (6.8400)	0.0753*** (6.9129)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8982** (-2.1464)	-0.8648** (-2.0721)	-1.2423*** (-3.2064)	-1.2029*** (-3.1147)
观测值	5766	5766	5766	5766
R ²	0.1730	0.1735	0.1972	0.1977

表 8 列示了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将企业党组织设立与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的交乘项变量引入模型 1 和模型 3。模型 1 的结果显示,该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 < 0.1$),模型 3 的结果显示,该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显著($p < 0.05$),表明随着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党组织设立对公平责任、效率责任的影响越大,这与假设 H_{3a}、假设 H_{3b} 的预测一致。将企业党组织设立与企业家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交乘项引入模型 2 和模型 4。模型 2 的结果显示,该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 < 0.1$),模型 4 的结果显示,该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p > 0.1$),假设 H_{4a} 得到支持,假设 H_{4b} 没有得到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在地方或其他党组织的工作经验会影响其认知框架、政策领悟能力,从而影响企业公平责任投入,而认知、政策领悟能力的消退需要较长时间,即使创办企业后仍然较长时间存在。然而,企业家过去在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中缺乏的技术技能可能会随着创办企业而提高,进而没有对党组织设立与效率责任之间的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表 8 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与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CSR_F</i>	<i>CSR_F</i>	<i>CSR_E</i>	<i>CSR_E</i>
<i>Party</i>	0.0560 (1.1523)	0.0635 (1.3773)	0.0637 (1.1806)	0.0606 (1.1069)
<i>Role</i>	-0.0775 (-0.8145)	0.0779 (1.3759)	-0.2261** (-2.2018)	-0.2250** (-2.1904)
<i>Experience_P</i>	-0.0098 (-0.1143)	-0.1867** (-2.4516)	-0.1047 (-1.1736)	-0.1575 (-1.3989)
<i>Party×Role</i>	0.1897* (1.6537)		0.2472** (1.9772)	
<i>Party×Experience_P</i>		0.2881* (1.9052)		0.0855 (0.5040)
<i>Age</i>	-0.2538** (-2.5626)	-0.2541** (-2.5714)	-0.3959*** (-4.0364)	-0.3955*** (-4.0305)
<i>Gender</i>	0.0106 (0.2608)	0.0122 (0.3008)	0.0340 (0.7396)	0.0346 (0.7520)
<i>Education</i>	0.0194 (0.7345)	0.0206 (0.7795)	0.0245 (0.9612)	0.0249 (0.9757)
<i>Participation</i>	0.0276 (0.8303)	0.0248 (0.7434)	0.0489 (1.2804)	0.0485 (1.2679)
<i>Experience</i>	0.0245 (0.7583)	0.0251 (0.7772)	-0.0000 (-0.0007)	0.0003 (0.0086)
<i>Satus</i>	0.0163* (1.6793)	0.0163* (1.6705)	0.0269*** (2.7290)	0.0269*** (2.7323)
<i>Structure</i>	0.0885 (1.5782)	0.0896 (1.6017)	0.1522** (2.4834)	0.1521** (2.4818)
<i>Decision</i>	-0.0125 (-0.3657)	-0.0132 (-0.3862)	-0.0720* (-1.9045)	-0.0723* (-1.9141)
<i>Equity_1</i>	-0.0756*** (-6.3870)	-0.0757*** (-6.3934)	-0.0486*** (-3.3237)	-0.0487*** (-3.3261)
<i>Equity_2</i>	0.0893* (1.6653)	0.0884* (1.6460)	0.1219* (1.9114)	0.1220* (1.9130)
<i>Firmage</i>	0.2294*** (10.1841)	0.2300*** (10.2250)	0.3445*** (13.5217)	0.3446*** (13.5324)
<i>Size</i>	0.2677*** (14.4288)	0.2671*** (14.4224)	0.3143*** (17.0218)	0.3144*** (17.0158)
<i>Region</i>	0.0293*** (3.1812)	0.0291*** (3.1634)	0.0752*** (6.9004)	0.0751*** (6.8937)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8760** (-2.0985)	-0.8759** (-2.1013)	-1.2175*** (-3.1543)	-1.2206*** (-3.1600)
观测值	5766	5766	5766	5766
R ²	0.1738	0.1739	0.1981	0.1981

3.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1) PSM 倾向性得分匹配。为了减少由于样本选择偏误产生的回归偏差,本文采用 PSM 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Heckman 等, 1998)^[51]。首先,本文使用 Logit 模型对匹配变量进行筛选,参与筛选的匹配变量为本文回归模型中出现的所有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为 0~1 虚拟变量,1 代表企业设立党组织,0 代表企业未设立党组织,同时控制了地区、行业和年度效应。此后,基于 Logit 模型的拟合值计算出相应的倾向得分值(PS 值),并采用“最近邻匹配”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PS 值进行配对。最后,采用“对被处理单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结果。表 9 列示了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的 ATT 回归结果,两个变量均在 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10 重新检验后的结果表明:匹配后的样本中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效率责任依然呈现稳健且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假设依然得到验证。

表 9 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ATT 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差	T 检验
CSR_F	Party	匹配后	0.4252	0.4610	0.0868	-0.43
CSR_E	Party	匹配后	0.5269	0.4985	0.0995	0.28

表 10 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关系检验—PSM 倾向匹配前后对比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匹配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CSR_F	CSR_F	CSR_E	CSR_E
Party	0.0749 [*] (1.6628)	0.0939 [*] (1.6997)	0.0884 [*] (1.7571)	0.1017 [*] (1.78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648 ^{**} (-2.0721)	-1.3098 ^{**} (-2.1569)	-1.2029 ^{***} (-3.1147)	-2.2896 ^{***} (-3.4918)
观测值	5766	3104	5766	3667
伪 R ²	0.1735	0.1617	0.1977	0.1404

2) Heckman 检验。为了进一步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对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研究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测试(Heckman, 1979)^[52]。在第一阶段中,通过 Probit 模型估计了民营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解释变量:企业家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政治参与、体制内工作经历、政治地位、企业家年薪、企业家实收资本占比、企业家所有者权益占比、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以及企业所在地区、行业和年份的虚拟变量),以此计算出逆米尔斯比 IMR。然后,将 IMR 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原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 11 模型 1 和模型 2。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对公平责任、效率责任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3) 2SLS 检验。为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民营企业体制内工作经历、企业当年吸纳就业人数为党组织设立的工具变量。首先,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市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分别来自农村精英、城市中的闲散人员。20 世纪 90 年代后,相当一部分体制内官员及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是以前是国有/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其在创办企业前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根据烙印理论,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所形成的烙印会增强其对党的政治文化观的感知,进而提高建立党组织的可能性(Marquis 和 Tilcsik, 2013)^[53]。因此,民营企业家的体制内工作经历对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意愿产生影响,但不会对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直接影响。其次,《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经济组织,都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企业当年吸纳就业人数越多,企业成员为党员的可能性越大,进而企业越有可能达到设立党组织的标准,但企业当年吸纳就业人数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以及企业吸纳就业人数是合适的工具变量。表11模型3和模型4列示了企业家体制内工作经历与企业吸纳就业人数作为工具变量的2SLS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与公平责任、效率责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表11 党组织设立与社会责任关系检验—Heckman检验、2SLS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CSR_F	CSR_E	CSR_F	CSR_E
Party	0.0751* (1.7285)	0.0900* (1.8821)	2.8111*** (13.0303)	3.6836*** (15.4672)
Experience	0.0243 (0.8216)	-0.0066 (-0.1853)		
Size	0.2648*** (16.2309)	0.3208*** (14.465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340** (-2.0861)	-1.1918** (-2.5629)	0.7003 (1.4318)	1.0678* (1.9349)
观测值	6855	6272	6507	7128
Wald chi ²	1119.34	1239.48		
去中心化R ²			0.6421	
				-0.6163

(2)分样本检验。北京市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政治生态比其他城市丰富,因此包含北京市样本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戴亦一等,2014)^[54]。本文进一步剔除企业注册所在城市为北京市的样本,检验结果如表12模型1~模型6所示。可以看到,结果与表3和表4保持了较高一致性,说明在去除北京市的企业样本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表12 删除北京市样本的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CSR_F	CSR_F	CSR_F	CSR_E	CSR_E	CSR_E
Party	0.0971** (2.1256)	0.0734 (1.4805)	0.0847* (1.8082)	0.1070** (2.1150)	0.0833 (1.5372)	0.1049** (2.0342)
Role	0.0705 (1.2551)	-0.1294 (-1.5976)	0.0656 (1.1654)	-0.0036 (-0.0553)	-0.2036* (-1.9490)	-0.0045 (-0.0681)
Experience_P	-0.0241 (-0.2769)	-0.0265 (-0.3036)	-0.2173*** (-3.1683)	-0.0832 (-0.9108)	-0.0856 (-0.9351)	-0.1164 (-1.0044)
Party×Role		0.2373** (2.3037)			0.2374* (1.8717)	
Party×Experience_P			0.3101** (2.0643)			0.0533 (0.30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12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CSR_F	CSR_F	CSR_F	CSR_E	CSR_E	CSR_E
常数项	-0.8187* (-1.9269)	-0.8349** (-1.9647)	-0.8313* (-1.9595)	-1.2032*** (-3.0911)	-1.2195*** (-3.1349)	-1.2054*** (-3.0943)
观测值	5571	5571	5571	5571	5571	5571
R ²	0.1713	0.1717	0.1718	0.2028	0.2032	0.2028

(3)2011—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公司—年度”的面板数据结构进行实证分析。该样本是由10个年度组成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16592个观测值。参照非上市公司公平责任(CSR_F)、效率责任(CSR_E)的构建指标,本研究采用企业共同富裕指标度量企业公平责任,包括员工保障、税收贡献、公益慈善投入等;采用净利润比上平均股东权益度量效率责任。由于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未披露民营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参照以往文献(柳学信等,2020)^[27],本文用党组织治理(Party)替代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采用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高管层衡量党组织设立。关于调节变量的测量,本文用董事会、高管层的党员规模(Role)替代企业家兼任党委书记,用董事会、高管层中的党员数量度量;关于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经验,本文用董事会、高管层成员是否有地方其他党组织工作经验度量(Experience_P)。参照非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控制变量,本文考虑以下因素:企业年龄,2020减去上市时间后取自然数对数;企业规模,总资产取自然数对数;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比值;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净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总资产增长率,(资产总计本期期末值—资产总计上年同期期末值)/(资产总计上年同期期末值);高管层规模,高管层总人数取自然数对数;市场化程度,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总指数。

表13列示了回归结果。模型1的结果显示,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公平责任显著正相关($p < 0.1$),模型4的结果显示,党组织治理与企业效率责任显著正相关($p < 0.1$),说明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促进企业承担公平责任、效率责任。将企业党组织治理与党员规模的交乘项变量引入模型2和模型5。模型2中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 < 0.05$),模型5中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 < 0.1$),表明随着党员规模的扩大,企业党组织治理与社会责任、效率责任的影响越大。将企业党组织治理与高管层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的交乘项引入模型3和模型6。模型3的结果显示,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 < 0.05$),模型6的结果显示,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p > 0.1$)。这说明,高管层的地方党组织工作经验增强了党组织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影响,而没有增强党组织设立对效率责任的影响,检验结果保持不变。

表 13 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公平责任、企业效率责任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CSR_F	CSR_F	CSR_F	CSR_E	CSR_E	CSR_E
Party	0.0373* (1.7713)	-0.0012 (-0.0463)	0.0141 (0.5830)	0.0068* (1.7717)	0.0014 (0.2919)	0.0035 (0.8482)
Experience_P	-0.0213*** (-2.6180)	-0.0203** (-2.4993)	-0.0217*** (-2.6651)	-0.0010 (-0.4953)	-0.0009 (-0.4296)	-0.0011 (-0.5201)
Role	-0.0045** (-2.2404)	-0.0053*** (-2.6721)	-0.0046** (-2.2759)	-0.0001 (-0.2834)	-0.0002 (-0.5428)	-0.0001 (-0.3073)

续表 1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i>CSR_F</i>	<i>CSR_F</i>	<i>CSR_F</i>	<i>CSR_E</i>	<i>CSR_E</i>	<i>CSR_E</i>
<i>Party×Role</i>		0.0144** (2.3590)			0.0020* (1.7480)	
<i>Party×Experience_P</i>			0.0770** (2.0852)			0.0110 (1.58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093*** (10.6232)	1.1063*** (10.6173)	1.1076*** (10.6002)	-0.1015*** (-3.3606)	-0.1020*** (-3.3732)	-0.1018*** (-3.3680)
观测值	16592	16592	16592	16592	16592	16592
F	241.23	236.71	236.49	22.87	22.39	22.39
R ²	0.5035	0.5042	0.5040	0.2318	0.2320	0.2319

六、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不同于以往研究从经济学、财政学等视角,从宏观层面探究共同富裕何以实现,本文从管理学科、微观层面解答这一问题,认为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微观实现机制。理论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整合第一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从而实现公平和效率协调的微观实现机制;第二,企业党建机制是与企业利益权衡机制、社会呼吁和监督机制以及政府规制机制并行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外结合的新机制;第三,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党建机制具有经济合理性;第四,东西方均存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外结合机制,英美企业体现为独立董事制度,德国企业体现为联合决策制度,中国的党建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微观机制。第五,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Carroll, 1979^[11]; 1991^[12])的本质在于企业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并明确两者在金字塔模型中的边界。运用大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促进了企业承担公平责任与效率责任;民营企业企业家兼任党组织书记增强了企业党组织对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的促进作用;民营企业企业家具有地方或其他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增强了党组织对公平责任的促进作用,但未增强党组织与效率责任之间的促进作用。

2. 进一步讨论

在明确企业党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晰这种促进的边界在哪里? 斯蒂芬·P·罗宾斯(2003)^[55]曾在其《管理学》中提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扩展的四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企业仅对股东负责;在第二阶段,企业开始为员工负责;在第三阶段,企业的责任对象逐步扩展到特定情境;到了第四阶段,企业逐渐承担整个社会的责任,并开始主动推动社会公正、保护环境、支持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本文将罗宾斯的这一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上限理论融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党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扩展的作用,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在T₀期,随着企业由第一阶段向第四阶段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也逐步从“股东”扩展到“第二级利益相关者”,并在“T₀期社会责任上限”处停止,形成“社会责任扩展曲线A”。当社会发展到T₁期,因为社会的进步,社会责任上限会上升至“T₁期社会责任上限”处,与此同时,代表企业对不同利益主体承担社会责任水平的“社会责任扩展曲线A”也会从整体上移到“社会责任扩展曲线B”。而在社会发展的T₁期,相对于没有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上移到“社会责任党组织扩展曲线C”,上限触及“T₁期社会责任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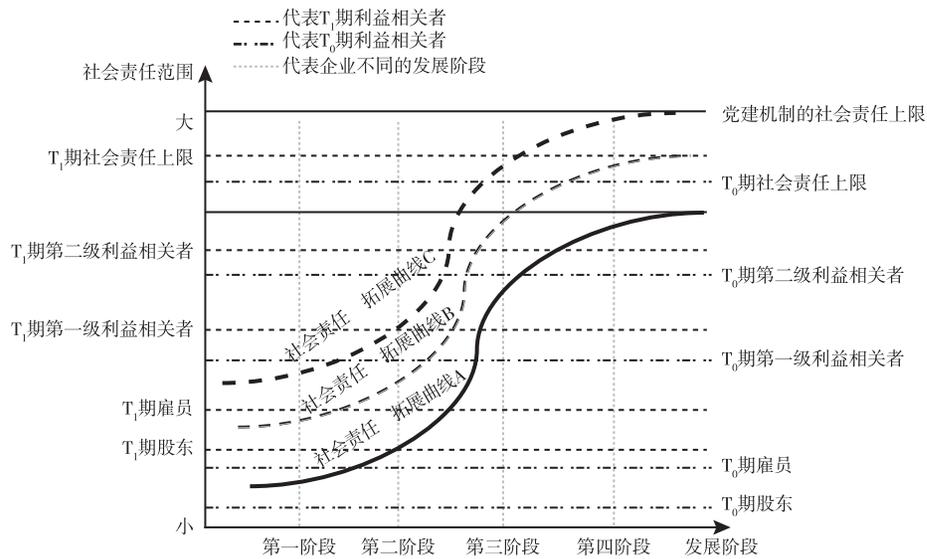


图3 企业社会责任上限及其动态扩展和党组织扩展

注：为保证图示简洁此图略去党建机制拓展社会责任曲线C的利益相关者示意线

进一步,本文认为,企业党建机制作为共同富裕微观实现机制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一方面,企业党建机制作为一种内外部结合机制的一般普适性。民营企业党建机制、英美企业独立董事制度、德国企业联合决策机制均是企业内外部结合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企业党建机制的社会嵌入性的一般普适性。如同独立董事制度和联合决策制度均是镶嵌在英美国家和德国的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民营企业的党建机制也是镶嵌在中国背景下的一种制度安排。

3. 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对于尚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和政府可以通过“单独建、链条建、区域建、行业建”等方式提高党组织覆盖率。而对于已经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和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实地调查和座谈交流的频率、增加党组织建设检查指导的次数、鼓励企业增加组织生活会的次数、给予奉献精神的模范党员物质和精神奖励等方式提高企业党组织活力。同时,党和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党组织吸纳有技术能力的党员人才、举办人才科技与企业合作对接会、建立技术交流平台、引进专家指导等方式提高党建与科技创新的联动能力,从而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第二,党和政府可以激励企业从内部管理层、技术骨干中推举党组织书记,促进党组织班子成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实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此外,企业党组织书记作为党组织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党和政府可以制定“线上+线下”结合的党组织书记培训示范班、推动企业党组织书记定期召开“书记讲党课”会议,提高党组织书记领导和治理党组织的能力,进而建设“德才兼备”复合型一流党组织成员队伍,从而助力企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党和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与企业党组织书记的沟通频率,及时了解企业党建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党建工作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第三,企业家过去在地方或其他党组织的经验所形成的政策领悟能力的消退需要较长时间,而企业家过去地方或其他党组织工作中缺乏的技术技能可能会随着创办企业而提高。因此,党和政府一方面可以向企业分配党建指导员,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将党的精神和宗旨传递到企业,进一步强化企业家在内的全体员工的政策领悟能力。党和政府也可以鼓励企业通过理论直通车、红色书籍分享沙龙、驿站课堂等“红色赋能”党建活动,把党的理论、思想送入企业,从而提高企业家在内的全体员工对政策的理解。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可以专门组织

培训课程,邀请技术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授课,从而帮助企业掌握最新技术,这可以提高具有地方或其他党组织的经验企业家的技术能力,将党建工作软实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硬支撑,从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4. 研究展望

本文的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本文使用慈善捐赠、环保治污、社会保险投入测量企业公平责任,使用扩大生产规模、企业新产品研发、企业技术创新、工艺改造测量企业效率责任,但仅仅反映出公平责任、效率责任的关键维度。受问卷的限制,本研究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指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测量。在将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以根据企业公平责任和效率责任的概念内涵,设计具体的测量指标并发放问卷来度量这两个核心概念。第二,本文经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认识到民营企业党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共同富裕的微观实现机制。不过,这只是中国故事的一个层面,除了这一因素,还是否存在其他共同富裕的微观实现机制?这也是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 [1] 厉以宁.文化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图图书馆,2018.
- [2]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
- [3] 李海舰,杜爽.企业社会责任与共同富裕关系研究[J].福州:东南学术,2022,(5):125-140.
- [4] 阳镇,陈劲.迈向共同富裕:企业社会责任的底层逻辑与创新方向[J].北京:清华管理评论,2022,(Z1):68-76.
- [5] Qian, C., L.Y.Lu, and Y.Yu. Financial Analyst Cover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Natural Experiment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40, (13): 2271-2286.
- [6] O'Sullivan, D., L. Zolotoy, and Q. Fan. CEO Early-life Disaster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1, 42, (11): 2137-2161.
- [7] Tian, T. Y., B. G. King, and E. B. Smith.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tatus on Employment Relat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3, 44, (12): 2833-2857.
- [8] Chen, Y. C., M. Hung, and Y. Wang. The Effect of Mandatory CSR Disclosure on Firm Profitability and Social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8, 65, (1): 169-190.
- [9] Waagstein, P. R. The Mandator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Indonesia: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8, (3): 455-466.
- [10] Baudot, L., Z. Huang, and D. Wallace. Stakeholder Perceptions of Risk in Mandatory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1, 172, (1): 151-174.
- [11] Carroll, A. B. A Three 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 (4): 497-505.
- [12] 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J]. Business Horizons, 1991, 34, (4): 39-48.
- [13]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北京:管理世界,2021,(8):117-129.
- [14] 孙豪,曹肖焯.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J].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4):3-24.
- [15] 李实,杨一心.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22,(2):27-41.
- [16]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北京:管理世界,2022,(1):52-61.
- [17] 吕炜,靳继东.财政、国家与政党: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J].北京:管理世界,2021,(5):24-45.
- [18] 吕炜,靳继东.从财政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22,(11):165-184.
- [19] 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97-103.
- [20] 周业安,冯兴元,赵毅.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1):56-65.
- [21]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北京:经济研究,2007,(7):36-50.
- [22] 魏光兴,陈永恒.锦标赛理论视角的共同富裕政策逻辑[J].北京: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12):3139-3150.
- [23] 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变迁[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24] 王修华,赵亚雄.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J].北京:经济研究,2023,(9):

98-115.

- [25] Zhou, P., F. Arndt, and K. Jiang.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Political Links and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1, 169, (4): 631-649.
- [26] 肖红军, 阳镇, 张哲. 私营企业党组织嵌入、企业家地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J]. *武汉: 管理学报*, 2022, (4): 495-505.
- [27] 柳学信, 孔晓旭, 王凯.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董事会异议——基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投票的证据[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0, (5): 116-133.
- [28] 李少斐. 经济制度变迁与党的组织资源开发[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 [29] 何轩, 马骏. 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2018, (3): 1-24.
- [30] Dimaggio, P.J., and W.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2): 147-160.
- [31] Scott, W.R. The Adolescenc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7, 32, (4): 493-511.
- [32] 陈光金, 吕鹏, 林泽炎, 宋娜.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25 周年: 现状与展望[J]. *天津: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6): 17-27.
- [33] 郝健, 张明玉, 王继承. 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二职合一”能否实现“双责并履”?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1, (12): 195-208.
- [34] 庄明明, 李善民, 梁权熙.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吗?[J]. *北京: 管理评论*, 2022, (11): 246-260.
- [35] 朱斌, 苗大雷, 王修晓. 控制与合法化——中国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机制分析[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2021, (3): 71-90.
- [36] 郑登津, 谢德仁, 袁薇.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盈余管理[J]. *北京: 会计研究*, 2020, (5): 62-79.
- [37] 黄杰, 郑静. 党建驱动慈善: 民营企业中党组织的公益效应与机制研究[J]. *北京: 公共管理评论*, 2022, (3): 123-147.
- [38] 王舒扬, 吴蕊, 高旭东, 李晓华. 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参与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9, (8): 40-57.
- [39] 连燕玲, 张明发, 周琼, 郑伟伟. 保持先锋模范性: 党员 CEO 思想烙印与企业慈善捐赠[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 (10): 3-20.
- [40] 徐细雄, 占恒, 李万利. 党组织嵌入、政策感知与民营企业新增投资[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10): 3-16.
- [41] Wang, Y., and J. You. Corruption and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 (2): 415-433.
- [42] 章高荣.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 党建何以促进私营企业发展——以 D 市 J 科技园企业党建为例[J]. *北京: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 (6): 53-61.
- [43] 陈东. 私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5, (8): 97-119.
- [44] 斯科特, W. 理查德. 制度与组织[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45] Mccaffrey, M. On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Incentives and Alertnes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 (4): 891-911.
- [46] 戴维奇, 刘洋, 廖明情. 烙印效应: 民营企业谁在“不务正业”?[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6, (5): 99-115.
- [47] 雷海民, 梁巧转, 李家军. 公司政治治理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非参数检验[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9): 109-121.
- [48] 程博, 王菁, 熊婷. 企业过度投资新视角: 风险偏好与政治治理[J]. *广州: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 60-71.
- [49] 徐尚昆, 郑辛迎, 杨汝岱. 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成长[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 155-173.
- [50] 王小鲁, 胡李鹏, 樊纲.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 [51] Heckman, J.J., H. Ichimura, and P. Todd.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8, 65, (2): 261-294.
- [52] Heckman, J.J.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79, 47, (1): 153-161.
- [53] Marquis, C., and A. Tilcsik.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7, (1): 195-245.
- [54] 戴亦一, 潘越, 冯舒.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 ——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4, (2): 74-86.
- [55] 斯蒂芬·P·罗宾斯. 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Party Building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Micro-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ommon Wealth

ZHENG Wen-quan, YUAN Yuan, XIA Chun-yu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Abstract: The foundational element of Chinese-style socialism is common wealth. The majority of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how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finance,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may be used to realize common wealth at the macro level. Few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aforementioned query at the micro and disciplinary levels of management. This study explains how common wealth can be realized from this new perspective and understands Party building of private firms to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micro-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mmon wealth.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framework to encourag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le also reclassify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based on Carroll's pyramid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defines the boundari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knowledges that it is fundamentally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three mechanisms that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ird-party appeal and supervision, and balancing corporate interests. It then suggests that the fourth mechanism, known as the party build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is a new mechanism that combin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o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aking the total number of mechanisms for promo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four. Furthermore, studies on party building pay less attention to methodicall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various degrees of party-building component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at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ntrenched in a single dimension plays. Furthermore, the overall social repercuss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ffec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private firms have not been further investigated in previous study on the subj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private enterprise party building promot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micro-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shared prosperity. It does this by methodicall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arty building constituent aspect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i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in order to balance efficiency and equ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 micro-mechanism that combines primary and tertiary distribution. Second, in addition to the mechanisms of interests within the firm, social appeal and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party build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is a new tool for promo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rd, there is economic logic to the party build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in encouraging businesses to be socially responsible. Fourth, China's party build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is an external and internal mechanism equivalent to Germany's joint decision-making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system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for the purpose of advanc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ifth, corporate equity and efficiency obligations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Carroll's pyramid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empirical research,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can encourag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take on fair and efficient responsibilities. Party organization secretaries who are also entrepreneurs bolster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in promoting efficiency and fair responsibility. Additionally, the work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s in local or other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reinforces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in promoting fair responsibility, but the promotion of efficiency responsibility is not very important. The paper's claim that "Party building in privat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 micro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ommon wealth" is supported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by the aforementioned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adds to the body of knowledge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arty building, proposes a micro-mechanism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shows that achieving common wealth involves broad, universal ideals that can be promoted globally and serve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for other nations.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y build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on wealth

JEL Classification: M13, M21, P31

DOI: 10.19616/j.cnki.bmj.2024.02.002

(责任编辑:刘建丽)